



不是日记的日记

杨 沫

125/23

抄 本

不是日记的日记

湖南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目 录

不是“前言”、“后记”，是开场白·····	(1)
时间在我心上变成了奔驰的骏马·····	(4)
一个科研人员出现在写作生活中·····	(11)
刻苦勤奋的人·····	(15)
两个意外的长途电话·····	(21)
从四十年代回到了八十年代·····	(30)
我的心迎着时代旋转了·····	(38)
闯进陌生的科研世界·····	(46)
朋友，我爱你们·····	(52)
回到北京以后·····	(57)
巨大的喜讯·····	(62)
风浪起来了·····	(66)
以桃代李，这笔账怎么算·····	(70)
呼吁·····	(76)
到南方来了·····	(83)
解剖自己·····	(89)

美丽的西子湖畔·····	(94)
少有的一天·····	(100)
“登不登由你们自己决定”·····	(105)
分子呵，你在哪里·····	(108)
《是这样一个人》的报告文学·····	(115)
录音剪辑·····	(137)
球赛·····	(146)
一个奇怪的挂号邮件·····	(156)
在北京市文代会上·····	(168)
想起和聂华苓重逢的日子·····	(177)
欲言未尽·····	(185)

不是“前言”、“后记”，是开场白

(一九八〇年三月××日于苏州)

近些年不大写日记了。现实生活丰富多姿、曲折、复杂。人的心境或象涟漪荡漾，或象浪涛汹涌，有时却也象深夜般地幽静。我不愿写流水账。要写出那些复杂的事和复杂的心境，却又不易。因之，一些年来，索性什么也不写——不记了。

要写这《不是日记的日记》，一是想回忆一下两年来修改——应当说是重写《东方欲晓》的经过和彼时的心境、心情。这段生活回味一下还是有点意思的。它把我带进了四十多年前风云突变的年代。那时，我还年轻，对生活充满了美妙、奇异的幻想。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中国的危急关头，我同时又被国亡无日的爱国热情所激荡、所鼓舞，跃身投进了革命的大熔炉。……这些生活，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使我不能自抑地想要再现它们。于是，还在“四人帮”横行时的一九七二年，我就开始写《东方欲晓》了。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我在北京郊区香山的抗震棚里完成了约七十万字的初稿。全书要分成三部。我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第一部的重写工作。本来应当开始修改第二部了。可是这期间，我无意中闯进了一个有关科

研和四化的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着复杂、新奇的斗争，充满着光怪陆离、眩人眼目的情节；充满着我从未接触过的崭新的动人的事迹；更充满着许多为四化奋斗不惜献身的人……是这样一些事和人把我带进了一种新的生活境界，也把我卷入一场意外的斗争漩涡。这斗争使我又仿佛回到了当年抗日战争的年代——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听，祖国和人民正在向我召唤！我又变成了一个战士，在为四个现代化战斗的新长征中，我高高地举起枪来——举起手中的笔，向阻挡四个现代化的障碍物冲去！我也许会因此负伤流血，也许会遭受什么意外。但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够为了贪图安逸、省心，为了保存那点儿“既得利益”，而从激烈的斗争中退下战场吗？不！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许可！共产党员的良心、作家的职责、人民代表的义务不许可！这篇《不是日记的日记》也就在这种心境和背景下诞生了。

我放下应当赶快动手修改的《东方欲晓》第二部而写这个，心中不是没有矛盾的。这部书全部修改完成后，要有一百三、四十万字。此外，我还想写出《青春之歌》下部来。不管怎么说，年岁不饶人，我剩下的时间毕竟不多了，我还能完成那些应当完成的任务吗？……我犹豫了。矛盾、斗争，有时心里很不安。最后，我终于分清了轻重缓急——党中央一再号召，作家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写四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最光荣最紧迫的任务。于是，我下了先写这篇东西的决心。

这篇东西我是想以写《东方欲晓》的写作生活为中心的。但必不可免，涉及到了我参与的斗争生活，它给与我更大的吸引

力，我不得被牵引到这个漩涡里去——从写四十年代的斗争到写八十年代的斗争。这两条不同斗争的线，无形中扭结在一起。我的心时而在四十年代（其实《东方欲晓》第一部写的是一九三七年的三十年代）驰骋；时而又飞回到当前的八十年代。“一心不可二用”，怎么办呢？生活还是命令我这么办了。

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于《日记》中这段生活里所接触到的好人好事，我一般都说出他们的真名真姓。对于一些有毛病、有错误，或者不便说出真名姓的人，则姑隐其真姓名，只鞭挞错事，决不搞人身攻击。当然，我并不是怕……

大幕就要拉开了，不过我不是这出戏的导演。导演这出戏的应当是四化当中的积极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其量，我不过是个拉幕的人，或者是个拙劣的讲解员或报幕员而已。

所以我称这开章第一篇为《不是“前言”、“后记”，是开场白》。

时间在我心上变成了奔驰的骏马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日于天津睦南道招待所)

岁月易逝。它迅忽象天上的流星，倏忽象江河的流水，消逝了，流去了。再也无法追回了。又是一个严寒冬天的到来。然而它不是七七年的冬天，也不是七六年的冬天，更不是我青少年时期——那么多对人生的幻想，那么多美好憧憬的冬天了。如今，我在过着一个个晚年的冬天。时间在我心上变成一匹奔驰着的骏马，它不听从主人鞭子的驱使，它无情地在生命的原野上奔驰，奔驰，它正载着我奔向那原野的尽头——生命的终了。

可怕吗？舍不得离开这生命的绿野吗？不，我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常常浮现在我心上的念头是：能够供我使用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该写的东西，该做的事情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呵！多得再有一次生命也不够。我该珍惜每一分钟，珍惜那已经剩下不多的生命的烛光……正是近几年出现的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七二年——正当“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我就想办法逃避了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学习班”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跑到北京的郊区香山，找了一间农民的小屋，偷

偷地写起《东方欲晓》来。没人理，没人管，那时候，写作还被看作一种危险的行业。有不少关心我的亲友劝告我说：

“杨沫，这年头你还写什么书？算了！不如歇歇，养好身体……”

“杨沫，象你这样三名三高的人，写东西是危险的呀！干什么要自讨苦吃？再说写了，谁给你发表？”

“江青常到香山来。她要知道你在这儿写东西，忽然找上你来，要看你写的东西怎么办？”

一句比一句可怖的话，常常响在我的耳边。要说我完全没有听见倒也不是。我听是听见了，可是并没有认真往心上搁。冠心病——这随时会拉我去见马克思的疾病，常常伴随着我，折磨着我。不抓紧时间写，那么多活在我心上的英雄，那么多用生命和鲜血搭救了我性命的人民，怎么可以叫他们随着我肉体的消失一同永远被消失在浩渺的太空呢？……不，为了那些曾在我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为了那些深深镂刻在我心底的英雄战友和可爱的人民，我决心写下去——大胆地写下去，写下去！

就这样，我从一九七二年初就开始写起《东方欲晓》。用了四年多的时间，熬过了一个个漫长寒冷的冬夜，又度过了一个个炎热难当的夏天，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的八月初，完成了这部稿子的最后部分。

记得刚刚完成这部近七十万字的初稿时，我是那样高兴，那样欢快。我终于把一块块矗立在我心头的丰碑移到了纸上，移到了人间。那些长期生活在我心里的人物，终于不致于完全被

泯灭——不会因我的消逝而消逝了。然而，这欢乐是短暂的——可怜的短暂。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我的脑子也慢慢开了窍。我写的都是些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把有些人物人为地拔高？叫他们象神似地高不可攀？我为什么不敢大胆地描写爱情？难道革命者就不是人，就没有发自肺腑的情爱和苦苦的相思吗？我为什么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叫普通的县委领导互相之间，充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错了！糟了！我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中了“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等模式的毒害了！当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后，我的心是痛楚的，羞愧的。非常地痛楚、羞愧！我心中的丰碑被我竖得摇摇晃晃、影影绰绰，我能不能难过吗？完全怪“四人帮”吗？不！我不这样想。我更多地是责怪我自己——责怪自己政治理论水平的低下，责怪自己文艺理论水平的低下。他们的那一套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东西，当时，我为什么就没有清醒地识破、看透呢？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和智慧去坚决地抵制呢？我吃了苦果，吃了“夹生饭”了！最后，在自我谴责的懊悔心情中，只有一句我曾对朋友们谈过的真心话可以挽救这局面——这就是“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我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那些不忠实于生活，不能叫人相信的东西。

现在，我在天津就是几乎在重写《东方欲晓》的第一部。原来的第一部太简单了，这次重写就是想把它变得丰富多采些。尽量叫它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恢复活人的本来面目。当然情节也有较大的变动——这一部主要是写沦陷后的北平地下斗争。第二部才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第三部则是又有根据地也

有敌占区斗争，把两种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写作生涯是甜的，也是苦的。当我每天早晨很早起了床，收拾好被褥和屋里零乱的书籍、报纸、刊物、信札等等之后，就洗脸漱口，完了，常常还不到七点钟，我就坐到靠窗的小桌上打开桌灯开始写作。当某一章节想得比较仔细、成熟，想得合情合理时，我的笔就在稿纸上沙沙地流畅地、象欢乐的小溪似地奔泻起来。而更多的时候则象老牛破车，艰难地、蹒跚地缓步而行。“江郎才尽”的痛苦常常折磨着一个作者的心。

因为严重失眠，早起没有一点食欲，我常不去餐厅吃早饭，等写到九点多钟，累了，这才喝杯麦乳精、吃块点心算完成了早餐的任务。每天上午是我给自己规定的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我极怕人干扰。甚至连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送报纸，什么人打来个电话，把我的思路打断后，我就立刻心烦起来，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烦躁不安。

十二点多钟吃过午饭，我回到屋里打开收音机听会儿音乐。我非常喜欢音乐。好的音乐家的歌唱，富有民族情调的优美的乐曲，都能使我愉悦，解脱我的疲劳。午睡在我也是件艰难的事情。每夜都得吃许多安眠药才能睡上五、六个小时；白天总不能再吃安眠药。于是最好的午睡是打个盹儿——睡上十几二十分钟。更多的时候根本睡不着。不过自己哄自己，钻在被窝里疏散一会儿而已。

好天气，我在午后二时至四时就出去散步。天津这个地方在唐山地震后，遭受损失大。现在还是熙熙攘攘、乱乱糟糟，路边常见搭起来的低矮简陋的“临建”——北京叫抗震棚，走起

来实在没多大意思。可是，不走不行，成天用脑子，再没有点体力活动，是支持不了长期的写作生活的。于是，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提着个手提包，一个人踽踽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有时顺路到商店买点水果和使用的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买，就这样走呀走呀——这是我一天当中最闲散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也并不都是闲散的。我正在创作中的人物，常常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跳到我的心上来。偶尔在路旁发现一个漂亮的姑娘：高高的个儿，长长的秀眉，一双乌亮的大眼睛，两颊绯红，焕发着青春的光采……我立刻想到我写的柳明的形象应当象这个姑娘——她美丽、端庄、娴雅……于是，有关柳明的故事情节，就一边走路，一边在脑海里盘旋起来……这叫休息吗？很难说。腿走着，脑子却不停地转着。我想，许多搞过写作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觉和体会——写作就象正在发着寒热病，你创造的人物——尤其是那些主要人物，他（她）无时无刻不在跟随着你，象影子、象魂灵儿一样缠着你。

时常在傍晚，下了班以后，佟愚恒同志就来找我。我们一起讨论《东方欲晓》第一部的一些问题。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和我同在冀中十分区根据地里相识的老战友。那时，他是个刚从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的年轻医生，我那时虽也很年轻，却经常疾病缠身。老佟是分区卫生部的医生，常给我看病，且又爱好文学，所以渐渐互相熟识了。不过解放后，将近三十年断了联系。去年偶然联系上了，当然很高兴。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东方欲晓》第一部里需要的某些素材，我不熟悉，而老佟却比较熟悉。为了搜集材料，得到老佟的帮助，也因为躲避北京家中那

个无法写作的环境，我就到天津来了。

写一部长篇小说，象工程师指挥建筑一座大型工厂。它工程大，需要的材料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材料。哪一方面生活不足，就象工程中缺少哪种材料，至少一个螺丝钉都不行——那怕有一个细节方面的知识不足，就会闹笑话。我常痛感自己文化水平低，只上了三年中学，这辈子就再没有机会学文化了。仗着自学了一点，也只是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写作起来，有不少地方就感到欠缺、空虚，力不从心。

晚间，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人疲倦了，不能写了，我就常常凝神望着浓黑的窗外。静静的夜，北方寒冷的风沙敲打着窗户，我独自沉思——漆黑的窗户外，那吼叫的风声中，那望不见的天宇里，似乎有许多张熟悉的面孔伫立着、晃动着，他们在向我微笑，在向我点头招手，或在我耳边絮絮低语……当这些书中的人物仍在陪伴着我的时候，我心中安谧、欢快、充实、温暖——当然，当想到某些人物的悲惨命运时，我也难过……可是，有时并不都是这样。为了写作，我经常离开家，离开家里的亲人，长年累月孤身在外，有时难免感到寂寞。尤其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还是经常要闹闹这个病、那个病的。这时，我就苦闷起来。尤其当心脏病犯了的时候，我既不能写，又不能读，只能一个人躺在被子里，绝对地卧床。那日子可真不好过！这时候，我就想起家里人——尤其想我最喜爱的外孙、外孙女——禾禾和蕾蕾来。这个时候，小说中的人物远远地离开我，痛苦中，我渴念着亲人、朋友，尤其渴念着两个孩子。我时常闭着双目喃喃低喊着：

“禾禾，蕾蕾，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正在高兴地看电视吗？……姥姥病了，姥姥在想你们……”想着、念着，不知不觉常有两行清泪滴落面颊……

蕾蕾学过弹筝，我把她弹得较好的曲子——《渔舟唱晚》、《春到拉萨》等曲子录下音来。当我想念蕾蕾的时候，就打开小录音机，放送起她弹的筝曲。听到那悦耳的古筝声，仿佛孩子就站在我面前，我的心就渐渐宁贴下来。

北方寒冷的冬天，孤独的创作生活，有时确是难捱的。而我的职业——我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却又决定了我必须忍受这远离亲人的孤单。没有孤单，我的创作便要消失。所以我宁愿忍受孤单，也不愿在影响创作的家庭生活中呆得稍长一点儿。

《东方欲晓》的稿纸一天天厚了起来。看着一叠叠的手稿放在案头，我用手轻轻抚摸着它们，双眼深情地望着它们，这种快活——或者说幸福，把病中的苦恼一古脑儿扫除干净。怨不得安徒生为了写童话，一辈子不肯结婚呢。我深深感受到了：童话给他的幸福和喜悦，也许超过了妻子和亲人。

一个科研人员出现在写作生活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日于天津)

这个月就要完了，我的生活仍然是平凡而又充实的。在平凡与充实之中常常还要加上一种焦灼之感。《东方欲晓》按计划修改——重写着。一些人物在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尤其是几个主要人物：曹鸿远、柳明、苗虹、王福来父子……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明晰到我可以用手触摸到他们、用眼睛清楚地看见他们的程度。他们有时是明晰、清楚的，可有时却又模糊、含混起来……我深深感受了创作长篇小说的艰难——不仅日日夜夜、寒寒暑暑要为每天能出一定的“成果”——写出三千左右的字数而奋斗。（有个同志形容创作象磨豆腐，很形象）。而且，那情感的波澜与思想的浮沉也常常摧心裂肝似地刺激着心扉。我总想把作品写得好一些，尤其经过了“夹生饭”的惨痛教训，我应当按照生活的真实，按照创作的规律，争取我写的人物，好的应当真实，应当可爱、可敬，不好的或坏的也应当真实可信，叫读者惋惜或痛恨，而且，不是抽象的爱和恨，而应当叫读者似乎亲眼目睹了这些人和事，动情地爱和恨……我这支笔能够做到这点吗？我能够叫广大读者随着我的笔端的运转而情感浮沉吗？这就是我

常常感到苦恼，感到不安的原因。而这种苦恼和不安，自从能够写作以来，就常常伴随着、追踪着我。也许这种苦恼和不安将伴随、追踪着我，直到生命终结，再也不能写作的时候……

前几天，吃午饭时候，大圆餐桌上，挨我坐着的一个青年人，忽然对我含着笑意说：

“你是杨沫同志吧？”

我对这个青年人含笑回答：

“是。你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吗？”

“我已经住在这里有些天了。”这个陌生的青年对我说。

我们各吃各的饭，一边吃一边谈。

“我早在中学时候就读过《青春之歌》，很喜欢，印象也很深刻……”这个青年人个子不高，有张娃娃脸和一双聪慧有神的大眼睛。口音似乎是上海人说北京话。

我随口问道：

“你是出差到天津的吗？是作什么工作的？”

他也随口回答：

“是天津市卫生局叫我来办个学习班，讲学和搞实验的。”

“来讲学的？”我有点儿少见多怪了。看他的样子，不超过三十岁，竟被天津市请来讲学。好奇心使我接着问道：

“你是研究什么的？是医生吗？”我想当然地以为卫生局请来的人，自然是医生。

他举着筷子摇头笑道：

“我不是医生。我是搞分子生物学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工作

的。”

“分子生物学”这个名词很陌生。也许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我又接着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在这个招待所还要住些日子吗？搞分子生物学？很忙吧？”

“我叫刘亚光。在这里主要做实验。同时还有不少其他工作。所以最近期间不能离开天津。”

吃饭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我也没问他住在哪个房间——这样偶然的邂逅，偶然地谈上几句的情况，经常碰到，经常发生。我也不在意。不过，这么年轻竟被天津市请来讲学的事，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又新奇、又高兴的印象。至于，这个人的名字，听完后我就忘掉了。

此后一两天，我们又在餐桌上相遇，又随便谈了几句什么。忘了姓名不好意思再问，于是，我就问他是什么单位的，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记忆力很差，听完了，我又忘掉他是在什么地方工作了。不过，当他谈到他正在从事分子生物学和中西医结合——尤其是和中医结合的办法来探讨治疗冠心病的时候，我非常感兴趣了。因为我正长期为冠心病所苦，许多老战友也都在为冠心病所苦，甚至不断地有些同志死在这个病上。于是，昨天一同吃过晚饭后，我就主动邀请他到我屋里坐一坐，谈一谈。

他坐在沙发上，当我问到他是怎么用分子生物学与治疗心脏病的探讨结合起来的时候，还没等这个年轻人回答，我就急